

吉林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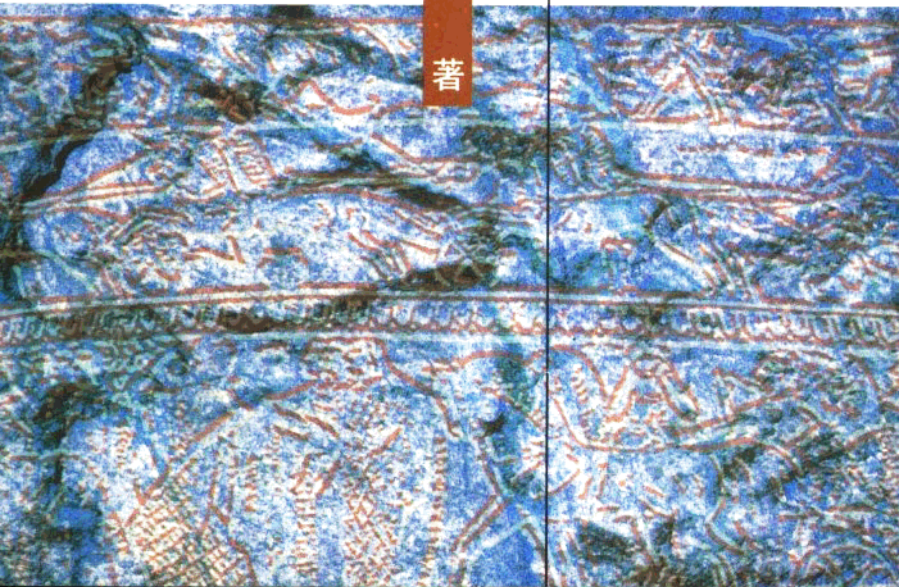
ZAOQI

XIFANGWENMINGSHI

ZHAJI

早期 西方文明史 札记

林中泽
著



说 明

本书是我从事专业工作 16 年来对一些问题的思考。在日常读书备课时常给自己设定问题，偶有所得，即随手写下，汇集成篇，如此日积月累，遂获心得 17 条，现经修定结集成册，算是对自己读书生涯的阶段性的总结。既然写作的动机不过是个人的爱好及教学工作的需要，其中绝无急功近利的因素，我便得以撇开一切来自个人利益方面的烦扰，使对问题的思考较能随心所欲，这一点读者将会容易感受得到。

在读者进入书中内容之前，我有责任为该书说几句话。

第一，中国人治西方史，尤其是西方的早期历史，肯定存在种种不利因素，例如语言习惯的隔阂及资料的占有就处于绝对劣势。虽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西方传统面前应无所作为或只能够满足于对其作一般性了解，但诚实的读书人总会正确地把握好自己，而不至于异想天开地期望不通过艰苦的努力就能做出一些填补国际空白的东西。我不愿无端地欺骗读者的感情，这就是我把书名定为“札记”的原因。也正是出于同一考虑，我在书中凡涉及到有关资料及别人的观点或结论时，必详加引注，以避免剽窃他人成果之嫌。

第二，我虽以享用他人精彩之作为乐，却无重复他人劳动之癖。按国内的传统，“学习”与“研究”属于两个不同的阶段，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对西方文明史仍处于学习阶段，但学

习本身也可以有新意。在对材料的占有明显落后于西方同行的情况下，我认为可以通过两个途径去获得新意：一个是选取别人较少关注的方面作为自己集中思考的目标，另一个是选取别人较少采用的角度和方法去对通行资料进行观察并作出解释。当然，材料占取方面的劣势总给我们的追寻工作设下许多没有路标的十字路口，这时我们只好根据自身的经验和逻辑推理作出有关方向的推测和判断。在这方面谨慎的读者也许会责怪我太鲁莽，但既要穿越人烟罕至的山道岂有不冒风险的？坦诚地说，我自己对书中的一些说法也无足够的把握，幸亏它不是什么救世的药方，也不致有误人子弟的危险。倘若有新的证据足以纠正我的差错，我会带着欣慰和感激的心情去接纳。

第三，本书把重点放在古代、中世纪及文艺复兴时代西欧文明个性即民族精神的历史发展上，由于以读书笔记的形式循序渐进地展开，书读行越多越觉察到自己的渺小，因此读者可以看出书稿中各章就深度而言并不平衡，其中第五章的第二节、第十一章及第十五章写作时间较早，内容及观点较空泛和幼稚，其余各章、节自我感觉还算差强人意。虽在结集时曾稍事修改，但也力避过分雕凿，以期留下读书历程的几分印记。

第四，本书虽然主要谈论西方的早期文明，但为了突出该文明的与众不同，必须找到它的某种对照值。我认为西方近代文明是它的纵的对照值，东方的早期文明则是它的横的对照值，因此在有关章节中已经贯穿着这样的纵横比较，这是十分必要的。为了强调这一点，书稿最后特收入两篇与之密切相关的附录，但愿它们不会成为一条多余的尾巴。

本书下编的第十二、十三及十四章在写作过程中承蒙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历史研究所为我争取到考察欧洲有关国家的基金；该所所长哈特姆特·拉曼教授（Professor Dr. Hartmut

Lehmann)对我的工作给予热情指导；该所曼弗里德·亚库鲍斯基—提森教授 (Professor Dr. Manfred Jakubowski-Tiessen) 及约根·斯拉姆波恩博士 (Dr. Jurgen Schlumbohn) 给我提供部分重要资料；该所的全体工作人员为我的工作提供了种种便利条件，在此一并表示衷心谢意。我还要特别提及我的老师蔡鸿生教授、曾醒时教授及学长林悟殊教授，是他们的教诲启发了我对整个书稿的修改；我的同事和朋友陈长琦教授及张庆海先生对于书稿的出版也给予了大力的支持。我尤其铭记已故的郑如霖教授，他是我进入专业殿堂的第一位引路人，他的与人为善和儒雅风格使我获益匪浅。

林中泽 1998年8月10日于广州

Original Spirit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In Pursuit of Ancient,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Europe

By Lin Zhongze, Professor of History,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FACE

I don't think a Chinese person has any advantage in understanding the cultural tradition of western countries, especially the earlier part of the culture, but I believe he can gain an insight into it by reading a great deal of good and classical works written by the first-class authors. For this purpose I have spent sixteen years in reading the materials and works, which time-span ranges from ancient times to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times, and which subjects are involved from soci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history, etc. Now this book is a result of my studying European history. It is a small book for a big subject, and it put its focus on the spirit and character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in early times-i. e. ancient,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times, and it is created mainly for the Chinese people who eager to acquire knowledge of the early European culture. This book consists of fifteen chapters(nine chapters belong to Greek and Roman civilization and the other six to Me-

dieval and Early Modern civilization) and two separate articles (they belong to the eastern civilization connected closely with western civilization), which are included as follows: 1) Export-Oriented Economy in Greek Society; 2) Solon's Contribution and Open Politics in Athens; 3) The Idea of the Golden Mean and the Awareness of Participation Among Greeks; 4) Athenian Women as Keepers of Slaves and Servants; 5) Disposition of Romans and Their Political System; 6) Roman Moral Crisis in Political Transition; 7)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Religion in Classical Greece and Rome; 8) Citizen-Military System in Classical Greece and Rome; 9) How to Face Death: A Philosophical Contemplation from Greeks and Romans; 10) The Rise of Christianity and Its Impact on West European Society; 11) The Origin of Serfdom in Medieval Europe; 12) The Religious Asceticism in the Middle Ages of the West Europe and Its Historic Effect; 13) The Women, Marriage and Sex in Medieval Canon Law; 14) Radicalism, or Conservatism: on Protestant's Views of Matrimony; 15) Reformation in Germany and Humanism in Italy during the sixteenth-century; 16) The Government-Religion Relationship in Ancient Orient; 17) The Origin of Early Russian Nation.

It goes without saying that the book is far from perfection, and it is sincerely hoped that critical suggestions will be given so that revision can be made.

I am greatly indebted to Professor Dr. Hartmut Lehmann, Director of Max-Planck Institut für Geschichte (Germany), for his kindly guidance and generous financial aid during my working in Germany in 1995-96; I owe many debts of gratitude to those who

have provided me with precious materials, suggestions, facilities and other helps-especially to Professor Dr. Manfred Jakubowski-Tiessen, Dr. Jurgen Schlumbohn, Ms. Brigitte Weiss, Professor Cai Hongsheng (my tutor), Professor Lin Wushu, Professor Zeng Xingshi, Professor Chen Changqi and Mr. Zhang Qinghai. I won't forget the late Professor Zheng Rulin, my first guide to profession, whose kindly friendship and consideration benefit me greatly.

L. Z. Z.

绪论：文明、文化传统与中西差异

随着两极对抗的世界体系的崩溃和多极化格局的出现，文明与文化传统这一古老话题重新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按美国当代学者塞缪尔·亨廷顿的看法，唯一能够填补冷战后意识形态留下的真空的是文明，世界秩序将通过人民的文化认同获得重组，全球性的政治由原先的意识形态政治又回复到文明政治，人类的差异重新体现为文明或文化间的差异。^① 这一判断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政治预言的范围，它的可信性已从国际社会对它所作出的迅速反应中得到证明。亨廷顿通过回顾过去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以其自身对于人类历史的深刻理解去把握当代文明社会的基本走向，因而使得他的观点在一向喜爱追逐潮流的国际问题评论界当中显得不同凡响；更重要的是，由于他不仅从现实而且从历史的角度揭示了文明的多元化及差异性，“西方”、“现代”与“先进”这三个曾一度被混淆在一块的词汇便得到了较为严格的区分，这意味着“非西方”的文化与西

^①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一章。

方文化可以在更加平等的意义上展开对话。

诚然，在科学技术发达、人类开始把自身的活动范围扩展到其他星球的今天，西方在一般中国人的心目中，仍然是一个难解的谜；如同中国给一般西方人留下的印象的那样。中、西沟通的主要障碍无疑是由各自文化传统的差异造成的。在谈到传统的时候，多数人（包括多数西方人）总是首先想到本民族那史诗般的经历，他们很少理会其他民族也曾创造出色彩斑斓的文化。其实，对于其他民族传统的研究和异域文化精华的接纳，丝毫不损于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发扬光大；近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证明：在文化观上采取夜郎自大式的自我封闭态度，终将窒息民族精神及文化活力而使自身陷于被动的局面。E. H. 丹斯说得好：“一个对其他民族的基本理想和文化一无所知的民族将永远无法摆脱灾难”。^①

当然，对于一个从小就受到本民族悠久文化传统熏陶的中国人来说，在没有足够的西方历史知识背景的情况下要真正领会诸如马克斯·韦伯的“理性的工业组织”这类抽象的概念是根本不可能的。单纯的文化输入无法达到与外部世界沟通的目的，中国人理解西方文化与西方人理解中国文化一样都需要通过中介的作用，这个中介再也不局限于语言文字方面的翻译工作，它应当完成这样的任务：虽然在开始时不得不用本民族的思维方式去解释对方民族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模式，但在结束时本民族的传统因与对方传统的交流和融汇而获得新的生机和活力。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为这一工程增添一块质地坚硬的砖，是新时代向每一位文化学家提出的神圣使命。

^① 转引自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著《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43页。

众所周知，“文化”是最容易产生歧义的术语之一。文化学家所理解的文化通常是历史遗产的总和，它作为无数个别文化现象的母体，与后者无疑存在着源、流关系和重大区别。文化学上的“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历史文化，这是不言而喻的。不过，不同领域的学者基于不同的职业本能和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结果便产生了有关它的五花八门的定义。我个人比较欣赏克里斯托弗·道森的见解，他在谈到“西方文化”时曾自豪地指出：西方文化“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和我们所体验的生活，它是我们自己的和我们祖祖辈辈的生活方式；因而我们不仅可以通过文献和遗物，而且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亲身体验来认识它”。^① 埃尔伯特·克莱格等文化史学家也持大致相同的观点，他们认为，“文化可以看作是由某个群体所建立的并可以代代相传的生活方式，它包括行为、物质资料、思想、习惯及宗教信仰。”^② 道森和克莱格等人的看法对于我们深入理解文化的内涵具有启发意义。广义上的文化的确反映着某种独特的生活方式，它指的是特定人群通过长年累月的积聚所获取的知识总和，其中不仅包括诸如自然科学、哲学和文学艺术等有形的知识，而且包括如思维方式、生活习惯和价值观念这类无形的知识；而为了理解这些事物的来龙去脉，人类知识所据以发生和演变的物质因素有时也不得不被归入文化的范畴。在文化这一包罗万象的体系中，各个不同部分各自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有形知识属于表层文化，它是文化的产物或体现；无形知识属

① 克里斯托夫·道森著《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② Albert M. Craig, William A. Graham, Donald Kagan, Steven Ozment, Frank M. Turner: *The Heritage of World Civilizations, Volume 1, to 1600*, New York, 1986. P. 3.

于深层次的文化，它是文化的灵魂；而物质因素则是一切文化的基础。虽然概念上的分歧是不可避免的，但广义上的文化在内涵方面的某些规定性恐怕也是无可争辩的。首先，文化具有民族性，不同的文化体系反映了不同的民族个性，因此文化必然就是特定民族的文化；只有民族性才有深刻性，缺乏民族性的文化是没有生命力的，不热爱本民族文化的人根本谈不上对其他民族文化的真正理解。其次，文化具有历史性，一个民族的文化，应是该民族历史的沉淀和传统的总结，离开历史的文化是根本不存在的，已故的钱穆先生在谈到中国文化时曾经指出：“除却历史，无从谈文化”。^①再次，文化具有相对稳定性，一种文化一旦获得定格，就会长期存留而难以磨灭；而在不受任何外来文化冲击和影响的情况下，这种稳定性大多会蜕变成一种极其落后和保守的惰性，防止出现惰性的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不断地通过与其他民族文化的接触交流而使自身获得更新。最后，文化具有重叠性，孤立存在的文化是极其罕见的，几乎所有重要的文化都曾经或正在与他种文化的不断接触中获得生机，正如布罗代尔所说：“对于一种文明来说，活着就是既能给予又能收受和借用。”^②例如我们在古希腊文化中看到了古埃及文化的影子，在中世纪基督教文化中发现了古代希伯来文化的成分，在汉代以后的中国文化中认出了古印度文化和古波斯文化的某些痕迹，在18世纪的欧洲文化中感受到了中国传统的某些影响。虽然文化重叠的现象正是文明接触和冲突的结果，但这种接触和冲突未必都要对文化的稳定性本身

① 钱穆著《中国文化史导论》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弁言部分。

② 费尔南·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第2卷，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76页。

带来威胁，按照布罗代尔的理论，文明间的冲突与交往可以不断进行，个体可以被异己文明所同化，但限定文化的边界却总是长期存在的，因而才有今天这样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①

在国内外的相关著述中，文化常常被混同于“文明”，不少辞书在定义“文化”和“文明”这对术语时，大多界线不明。^②其实，这两个术语的词义虽然存在部分重叠的现象——例如两者都可以用来界定人类社会知识财富，但它们在许多具体的方面却有着明显的差别：文化，起源于拉丁文 CULTURA，该词的第一层意义是耕作，第二层意义是崇拜，第三层意义才是文化教养，可见西方意义上的文化最初是由耕作以及与耕作有关的信仰习俗进一步引申而来的；文明则源于拉丁文 CIVILIS，该词的基本意义是城市或国家，引申义为温和得体和知书识礼，亦即“文明”，这表明文明一词与国家政治制度的关系更为密切。既然文化侧重于经济而文明偏重于政治，文明势必随着政治制度的衰落而毁灭，并随着社会形态的更替而更替；文化却不会因政治因素的变动而消失，它只能随着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而不断得到充实。其中的道理很简单：社会政治制度是经常变动的，而经济活动则是与人类相始终的。古希腊文明是与古希腊的政治史一道灭亡的，但希腊文化却作为西方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被保存了下来；玛雅文明在今天的美洲已消失得无影无踪，而玛雅人的文化却几乎为全世界的人类所吸收和利用。由此可见，尽管文明也具有民族性和历史性

^① 费尔南·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第2卷，第184-186页。

^② 参见国外百科全书条目选择《文明和文化》，求实出版社1982年版；亦参看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23-28页。

这两个特征，但它并不具备稳定性这一特征。除此之外，人们也习惯于把文明理解为文化内部的一个特定阶段或特定类型，即一个民族的文化体系常常可以由若干个不同类型的文明所构成，如古典文明和中世纪文明共同构成近代以前的西方文化，印度教文明和伊斯兰教文明共同构成近代以前的印度文化，等等。

那么，在文化与文化传统之间又存在着哪些内在联系呢？从本质上来说，两者没有根本的差异，文化与文化传统都属于特定民族的历史沉淀。不过，两者的侧重点是有所不同的：当我们站在今天的角度去衡量一种历史沉淀时，它就叫文化；当我们站在过去的角度去衡量同一种历史沉淀时，它就叫文化传统。换言之，文化研究的主旨在于展现历史的结果，而探索文化传统的主要目的则在于揭示历史的原因。我们也可以把文化理解为一个业已完成的工程，把文化传统理解为完成该项工程的过程。然而，文化体系形成过程的复杂性显然是无法拿任何现成的例子去加以类比的，这一过程必然充满着种种矛盾与冲突，其中不同民族文化间的激烈竞争、相互排斥及容纳吸收则成为这一过程的主线。这一过程在今天的人类面前已经形成为一幅暂时不动的横断画面，在这一幅画里，过去的种种矛盾与冲突只留下了一些静态的痕迹——当今的西方文化格局正是如此。

在当今世界上各式各样的和自成体系的文化类型中，西方文化如同中国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一样是比较引人瞩目的。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要想勾勒出西方文化的某些主要的外表特征，一个再好不过的对照值无疑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了。首先，由于政治统一的实现、汉族主体地位的确立及文化体系的较早定格，中国传统思想在外延扩展方面的势头远逊于内涵上

的发展。在这里，环境因素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文明起源于内陆地区河流交错的冲积平原和三角洲，它基本上是单一的农业文明，内陆地区物种的丰足扼杀了它的冒险精神并为其铸就了一种安于现状的民族心态，虽然它也有过四出伸张的辉煌时期并最终使“四海归一”，但它的扩张尤如山川积水向低洼湖泊流动，只是顺其自然而已，一遇到高原台地，就会停滞不前；经济生活的单一增强了它的封闭性，因此它始终局促于东亚一隅，长期无法冲破大海和沙漠的隔绝而与其他文明中心进行正面接触。西方传统恰恰相反。西方文明发端于希腊和罗马时代，哺育出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的是由大海环绕的半岛和岛屿，海岛资源的局限性铸就了这类文明外向发展的特征，避免受孤立的心态迫使西方人一开始就千方百计地寻求与外界的接触，因此西方文化像荒原烈火那样只会借风力的作用越烧越猛，不会因崎岖山岭的阻隔而徘徊不前。扩张性必然导致多元性，西方文化只有在不断借助异域文化加以补充的情况下才能继续生存和发展。例如，希腊文明本身就是在埃及和西亚文明的刺激下诞生的；公元前4世纪晚期至2世纪中期的“希腊化”，是西方文化第一次与东方文化的大规模交流，通过这次交流，希腊精神摆脱了与城邦制度同归于尽的厄运，并在东方传统的作用下得到充实和升华；此后，罗马人虽然以惊人的速度征服了希腊和中东地区，但希腊文化和东方文化却以更快的速度征服了罗马——罗马人几乎原封不动地继承了希腊的传统和东方的精神；基督教官方化和日耳曼征服这两件划时代的事件常常被看作是西方古典传统彻底衰亡的信号，实际上它们更像是地中海各类文化进一步融合并向内陆地带扩散的一个重大标志；发生于中东地区和西班牙半岛的十字军运动则使西方因获得伊斯兰文化的新鲜血液而得以逐步走出“黑暗的中世纪”；

从15世纪末开始的探航狂热预示着西方文化全面扩展的新时代的到来，与之相接触的印度文化、美洲文化和远东文化，非但不能减弱它的锋芒，反倒刺激了它的活力，助长了它那咄咄逼人的声势。其次，在绝大多数时期里，中国文化舞台上的主角基本上是单一的汉民族，汉文化中的正统则始终是儒家的思想和传统；中国正统思想中最重要的要素，如家国一致、忠孝一体、仁政、大一统及以读致仕等等，都来自儒家的学说，虽然在中国的历史上儒家传统有时受异域文化的冲击，但是这些异域文化到头来不是被同化，就是被改造得面目全非；对于汉族正统文化来说，异族和异域的影响不过是一种较为次要的补充。在西方文化的舞台上，主角却是由多个不同的民族轮流扮演的——最初是希腊人、罗马人和日耳曼人，后起的依次是西班牙人、英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西方文化的核心部分，是由不同的民族分别于不同的历史时期提供出来的，例如从希腊城邦的平民政治中萌发出最早的民主观念，从罗马的宪政中产生了古典的法制精神，从日耳曼人的社会生活中造就了淳朴的自由风气，从基督教的经典中引申出平等和博爱的思想，等等，若不是具体到特定的时代和特定的地区，恐怕谁也不准西方人以哪一种学说或思想为正统。第三，中国文明的产生既然与季节性分明的农业经济联系在一起，对气候条件的过分依赖以及周而复始的农事活动便为汉族先民提供了一个认识论基础，这就是“人性善”。正统儒学认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只是由于社会环境的不良影响，才使得一些人由善变恶；要遏制这一趋势，挖掘和弘扬人的善良本性，最基本的途径是从我做起，通过每个个人的自我完善去净化社会。因此中国古代的政治实际上是一种伦理政治，这一政治把道德教化看作是安邦治国的根本，把施行法治看作是迫不得已的辅助手段。发端于

海岛并与贸易和投机冒险结下了不解之缘的西方文化则把“人性恶”当作其认识论的前提。早期的西方人认为，人的本性是自私的，人们总是关心与自身利益直接相关的事物而漠视与自己无关的事物，^① 为了克服这一天生的毛病，人们需要缔结法律和组成国家——这是人类去恶从善的唯一途径；后来的基督教更进一步认为，人类不仅有自私的毛病，而且有冒犯造物主的罪恶，只有通过宗教的赎罪，人类才有可能获得上帝的原谅并达到内在的善。第四，就宗教信仰而言，中、西传统也大异其趣。古代中国的宗教属于一种等级结构繁复、内容庞杂的多神崇拜，它本质上是家族为中心的祖先崇拜。这一崇拜体系的出现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其发展的阶段性似乎并不十分明显。由于君主被赋予“天子”的身份，天地与人类之间就被用一条假定的血缘纽带联结在一起，君主祭祀先王与祭祀天地具有了同样的性质——祖先崇拜；臣民对于君主及其权力的崇拜也是祖先崇拜的扩大化，因为国家实际上被认为是一个超级大家族，君主就是这个家族的家长和创立者。在这种信仰体系下，古代中国人就只能把家族的延续当作是超越死亡的唯一途径，他们认定他们的灵魂已经为他们的亲生骨肉所继承，这就是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奥妙所在。这种宗教理想准确地反映着古代中国的社会现实，因此它是较为实际和功利主义的。西方宗教的发展则经历过重大的历史转折而呈现出更加明显的阶段性：从希腊罗马的多神崇拜发展为基督教的一神崇拜——即从外在的仪式宗教发展成为内修的启示宗教，从崇拜造物主发展成崇拜造物主；从作为被压迫人民斗争手段的早期基督教发展成为具有完整神学体系并处于“万流归宗”地位的

^① 亚里士多德著《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48页，第8-9页。

中世纪基督教。与中国的传统信仰不同，基督教把对于来世天堂的向往和对于地狱的恐惧作为善恶的伦理法则，把对于来世永生的追求作为超越死亡的途径。无论是古典宗教还是基督教，都把祖先排除于崇拜对象之外，宙斯和上帝都不是人的祖先，而是人的创造者，这自然与西方社会血缘关系的较早衰亡和国家法律制度的较早出现有关。西方的宗教理想与西方的社会现实之间往往形成鲜明的对照：虽然西方社会实际上存在着严重的等级制度和阶级歧视，但西方宗教却以达到“普世平等”为目的，基督教在这方面尤为明显；尽管中世纪的西欧世俗政治以分散和无政府状态为特色，但基督徒则孜孜不倦地追求一种上帝的永久和平，并试图通过教会去确立一种永恒秩序。由此看来，在西方的宗教理想与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着某种互补关系。最后，古代中国人认为，事物的横向关系应是协调有序的，纵向发展应是平稳渐进的，因此中国文化强调群体的内聚作用、自然秩序以及个体对自然力量和社会的顺从，儒家传统的“天人合一”正反映了一种把个人、社会和自然界融为一体的企图；基于这种适应自然和社会环境的愿望，一般中国人只把工作当成是谋生手段，把勤奋看作是实现自足生活的途径，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技术的进步和科学体系的发展。西方传统虽然也承认有一个最高主宰在支配着人类的活动并预定好了每个人的最终归宿，但它却把人类摆在万物之首的地位。亚里士多德认为，自然不造无用之物，而一切有用之物均为人所用；^①与希伯来传统一脉相承的基督教神学也认为，上帝之所以创造出世界万物，只是为了给人提供各种服务。在这种观念潜移默化影响下的西方人常常把自身与自然界对立起

^① 亚里士多德著《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48页，第8-9页。